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土家族古籍文丛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

彭武文 著



吉首大学图书馆

岳麓书社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土家族古籍之七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编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

彭武文 著
论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杨锡光

彭继宽

翦建文

封面设计：央 叶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土家族古籍之七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

彭武文 著述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发行 长沙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6 千字 印张：5.75 印数：1 2000

ISBN 7-80520-455-1

I·269 定价：4.5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在国家民委和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指导下，由各省（区）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分别加以整理、意译出版的。湖南的民族古籍属其中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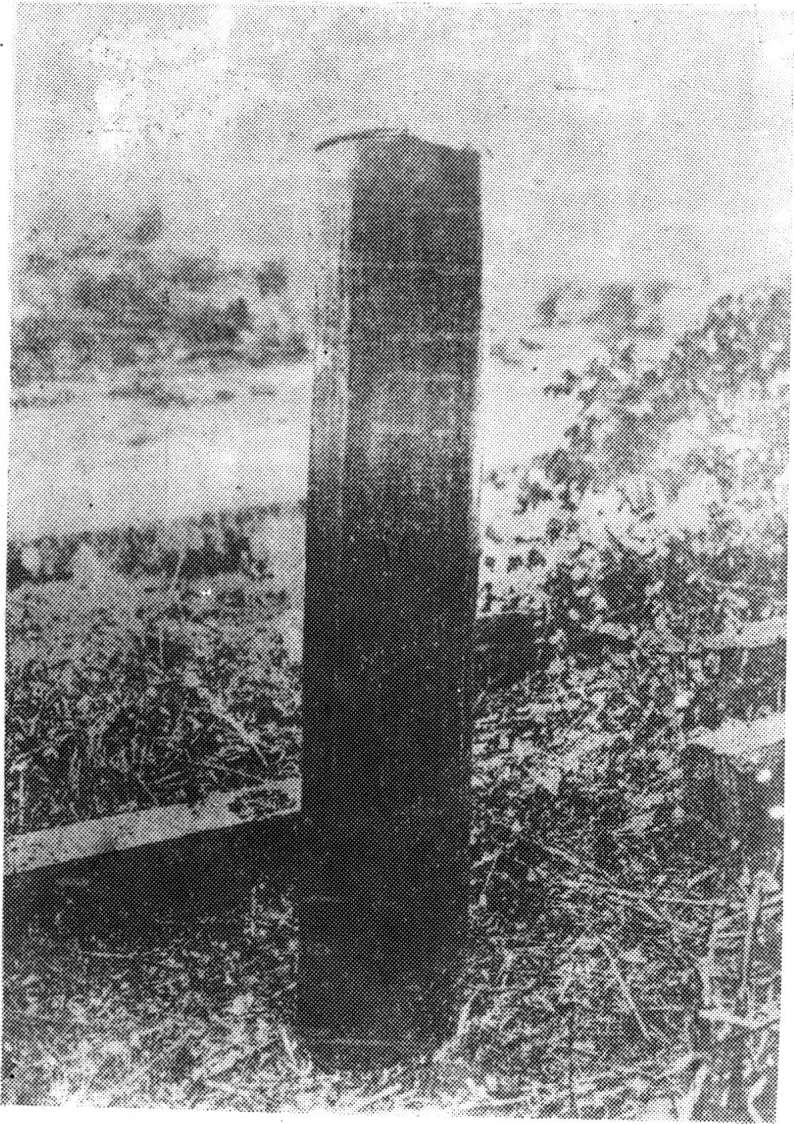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 51 种少数民族，520 多万人口，分布在全省各地。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民族古籍文献，是伟大祖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 1986 年的初步统计，土家、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等民族有各种古籍 300 余部，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各民族丰富精深的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思想、观点。以及绚丽多姿的文化艺术。

党中央、国务院对整理出版民族古籍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国务院国办发（1984）30 号文件中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我省已拟定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近期和长远的规划，从 1986 年起对省内各民族古籍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整理，并有选择地陆续出版。这对于加深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丰富民族学的研究，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社会思想史；增强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
领导小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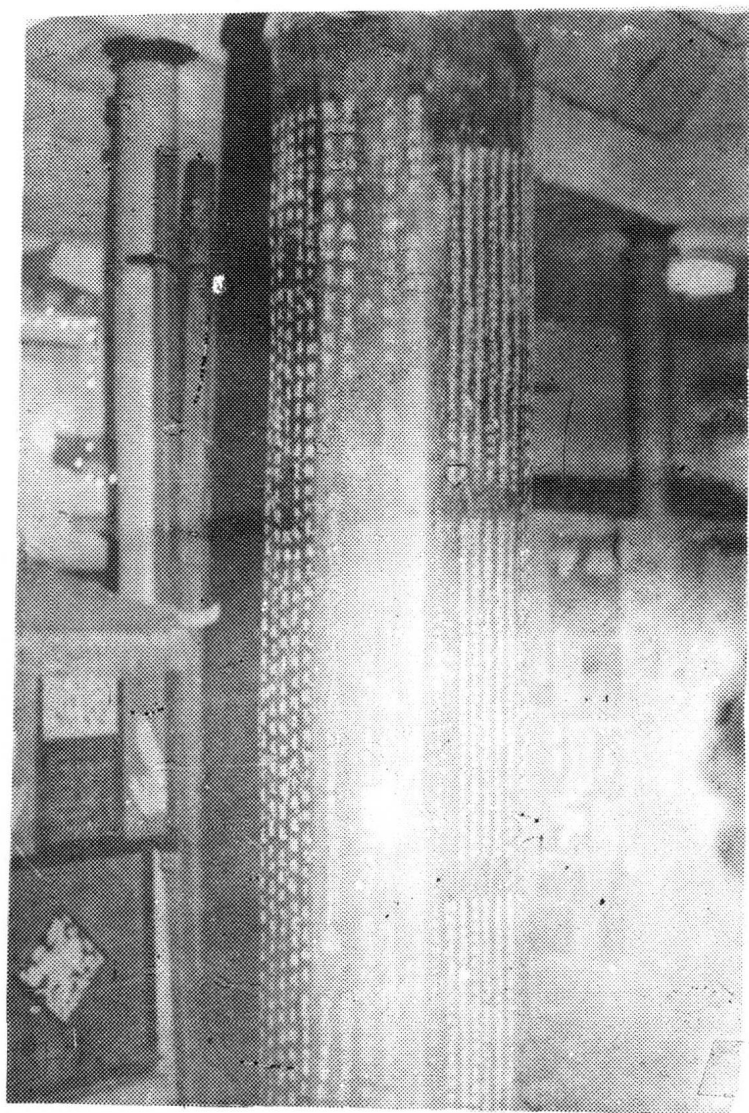
溪州铜柱
现珍藏湘西民俗风光馆内



溪州铜柱
原址：会溪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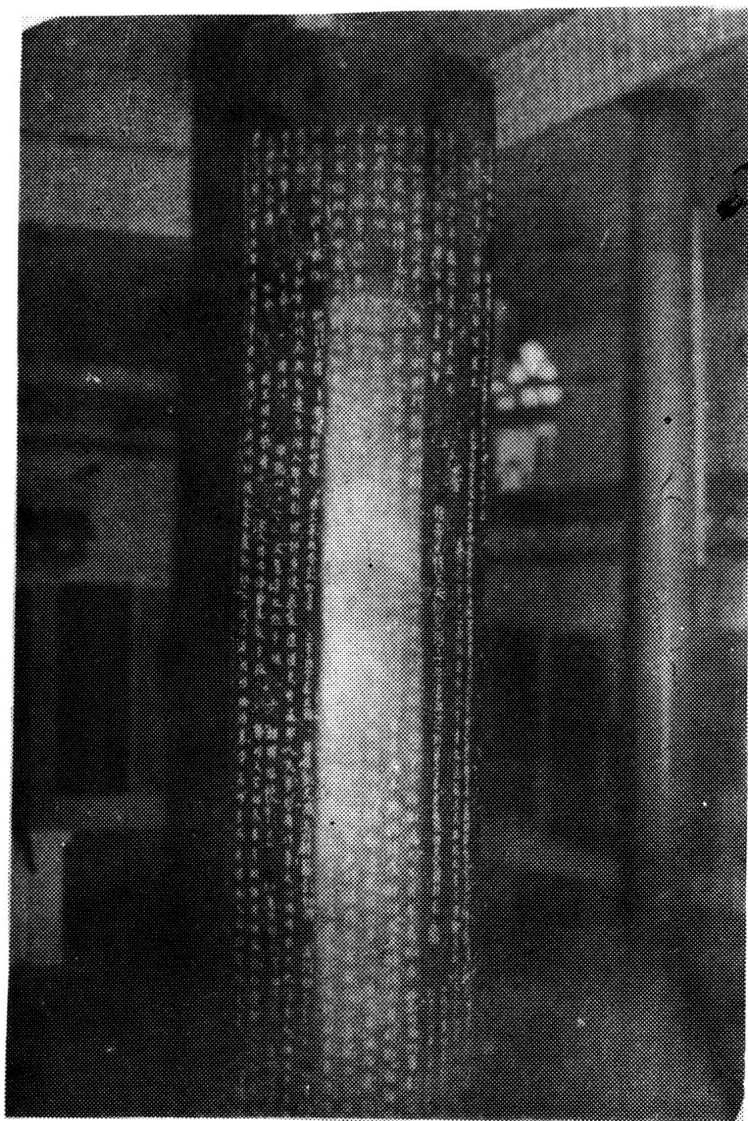


溪州銅柱銘文拓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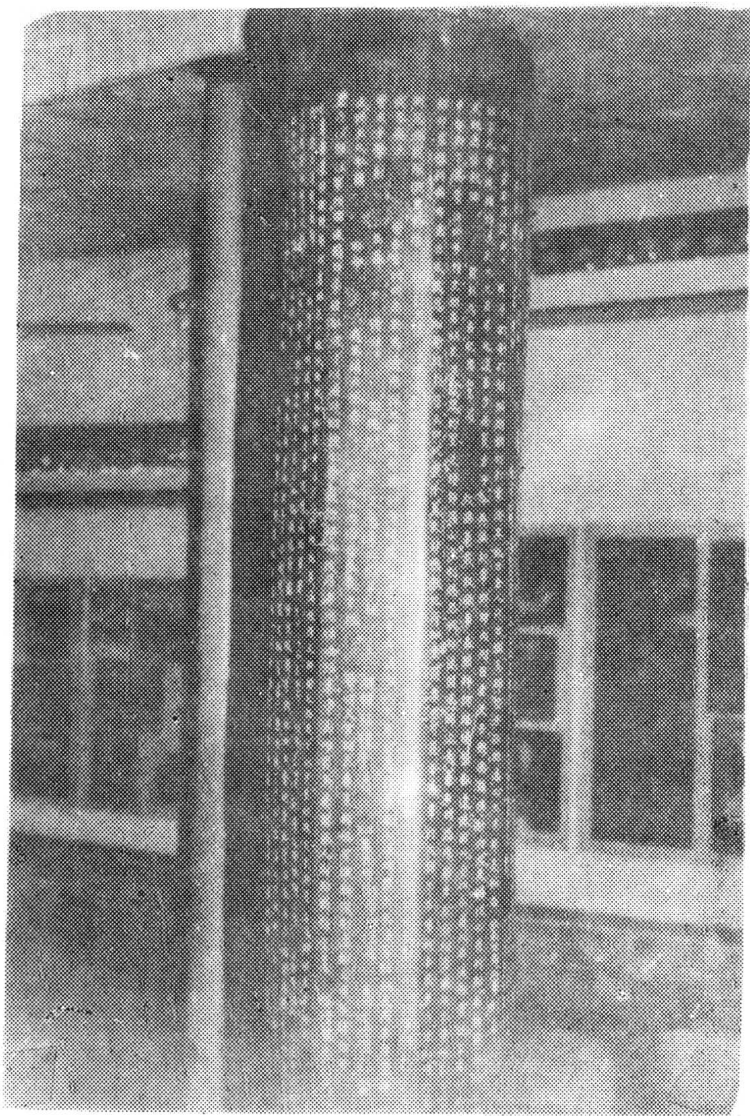


铭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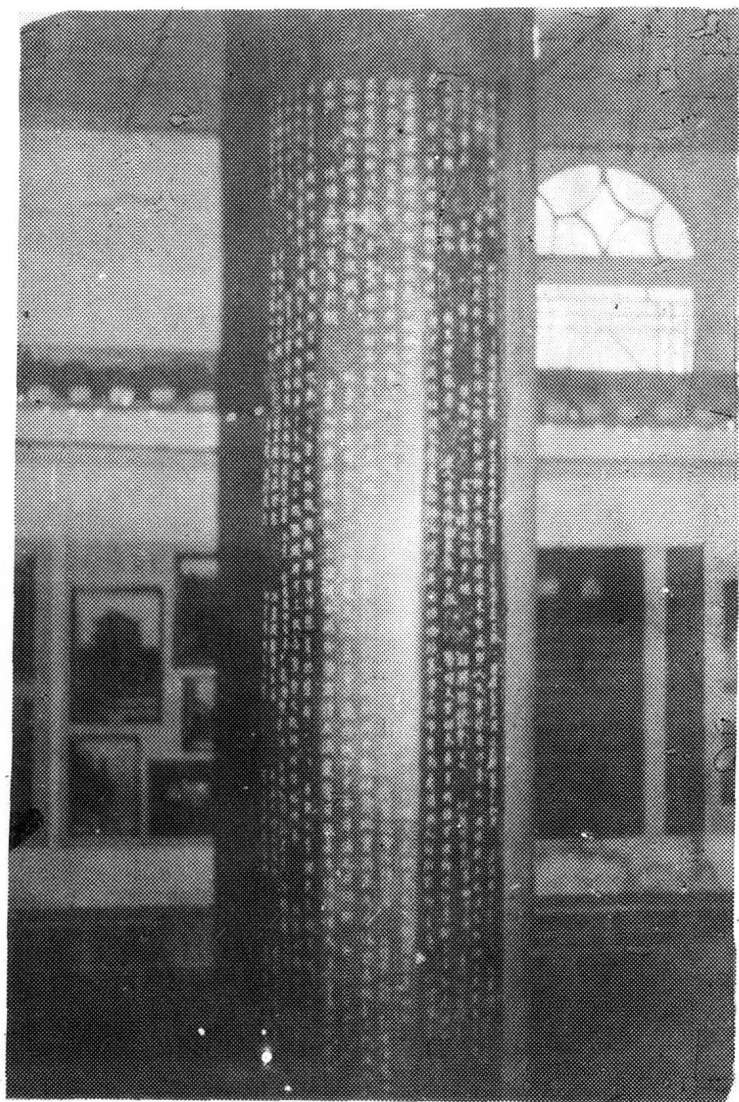
1—2 面



铭文
2—3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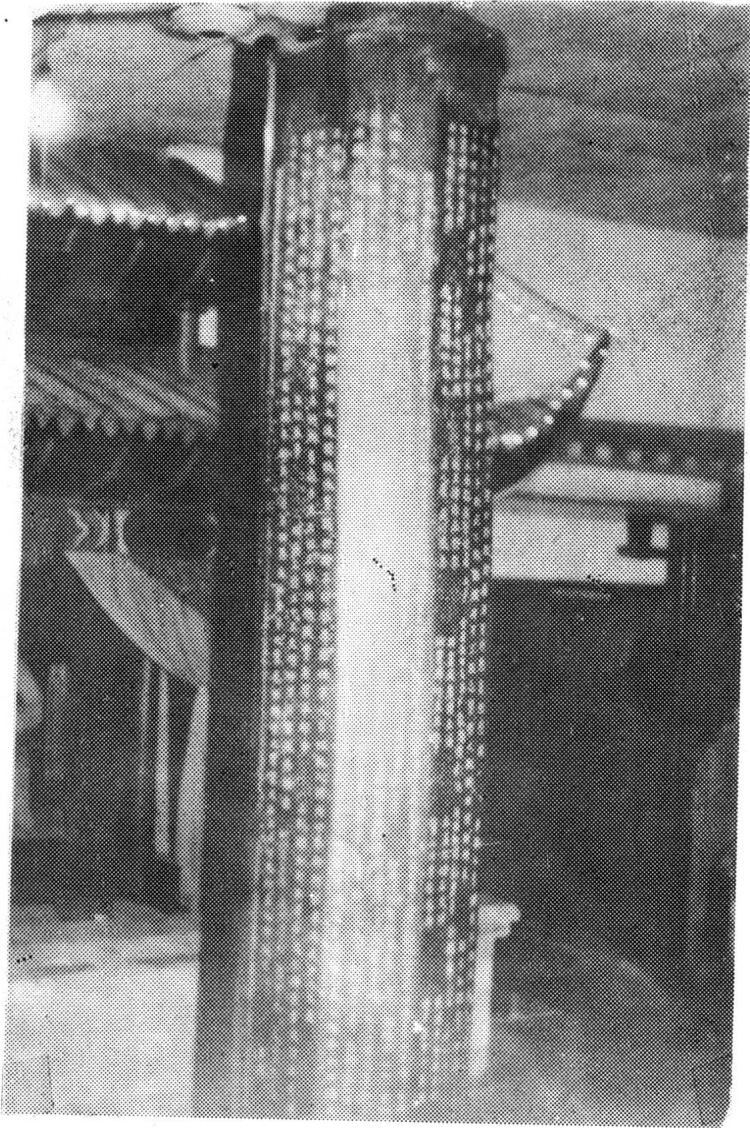


铭文
3—4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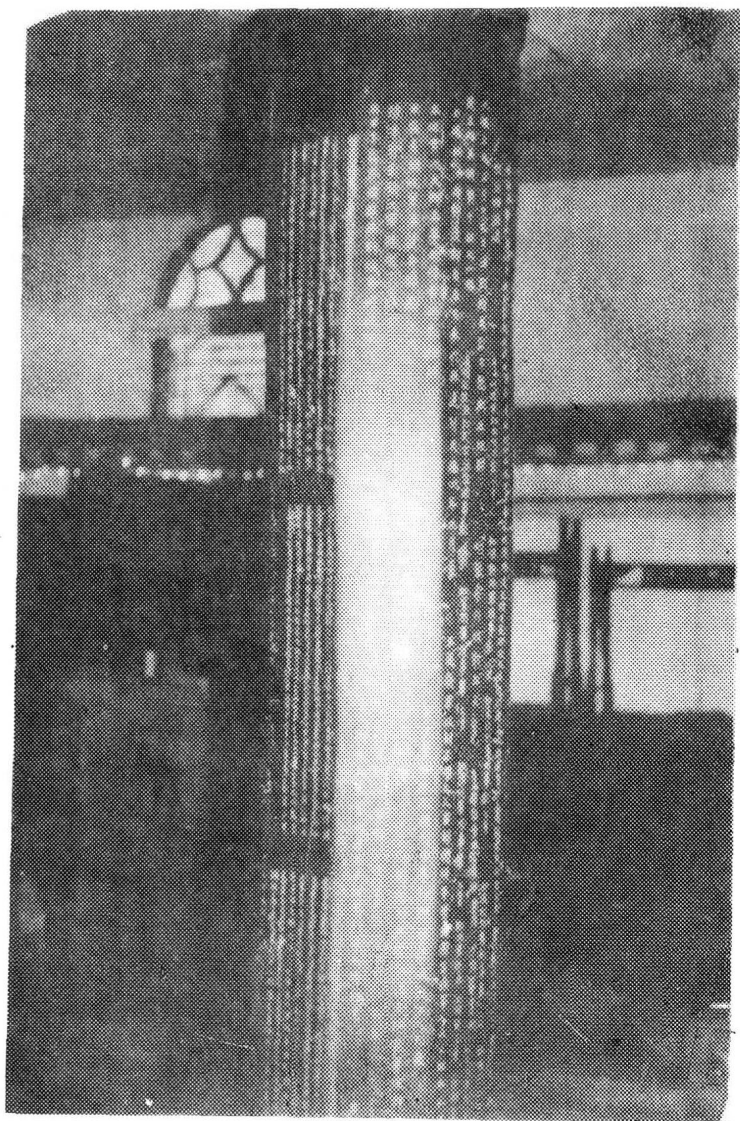
铭文

5—6面



铭 文

6—7 面



铭 文

7—8 面

图片均为彭武文摄

序 言

溪州铜柱的历史悠久，实物尚存。它是南方民族地区极其珍贵而稀罕的民族文物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尤其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物古籍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因此，很有必要和可能对溪州铜柱进行抢救、整理和研究。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之精华，抛弃民族文化之糟粕，具有深远的意义；《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对于研究南方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民族关系学及土家族历史文化具有实物见证之作用；还可以补助“诸多正史”之不足等等。

溪州铜柱及其铭文，历时已有一千零五十余年之久，铜柱铭文总字数为二千六百一十四字。主要记载了楚、蛮双方订立盟约的历史背景及若干规定，其内容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

从北宋以后，有诸多著名的金石家、史学家、民族学家对溪州铜柱铭文，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记载和论述，其学术观点似有“百家争鸣”之势。如何呈现此现象？这是与铜柱问世的时代有关。溪州铜柱是后晋天福五年十二月竖立问世的。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称作“五代十国”时期，它处在一个封建割据的局面。在这五六十年的时间内，战争频繁、朝代更迭迅速。五代夹在唐、宋两个朝代中间，实际上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到统一的过渡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之内，军伐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对五代十国史，研究者

甚少。所撰之文其质量显低，良莠并存、正误杂揉，令今人常生疑窦。

关于五代十国史实之记述，到了北宋前期尚能形成一个高潮，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期已得到进一步发展。五代史，对于北宋人来说，是近代史，不少学者对于此段历史事实是记忆犹新的。又加上以前少有人研究五代史，因此，诸多学者对五代史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当时出现了用多种文体、如：纪传体、编年体、笔记小说体、以及用碑志传状的形式，从各个不同侧面记载了那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如：薛居正撰《旧五代史》、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路振撰《九国志》、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等书先后相继出版问世。其他还有诸多野史也随即出版。

对《五代史》的研究，到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个低潮，因研究者甚少，其成果并不显著。

历史发展到清代，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很重视“史学”研究。于是又掀起了研究《五代史》的新高潮。清康熙年间吴任臣撰《十国春秋》，他比以往任何作家更为具体和全面地记载了李弘皋撰溪州铜柱铭文之事迹。虽然如此，但《十国春秋》仍然漏撰“铜柱铭文的十九人衔名和五十四人衔名及维天禧元年加刻之文字”。清人黄德基等编纂《永顺县志》于清乾隆五十八年手抄本问世。清著名金石家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其中载有溪州铜柱铭文二百九十七字，于清嘉庆四年十月（公元1786年）出版问世。另外还有《古文坪厅志》、《保靖县志》及其他县志和地方志，亦涉及到溪州铜柱铭文之内容。

清人之书有关溪州铜柱铭文之记载，没有那本是齐全的。而且在学术观点和铭文记载方面，比起五代和宋代学者来说，其舛误更多，对后世学者的影响太深。因此，今日应以科学态度，

对其舛误给予应有的纠正。

新中国诞生后，亦有少数学者对溪州铜柱铭文有一定的研究；如：谢华撰《湘西土司辑略》的第三章专撰溪州铜柱为内容。此书系1959年11月出版问世。谢先生撰写铜柱铭文具有十三页之多。其内容较全面，即有天福原刻文字亦有加刻文字。但其舛误仍然不少，本书亦予以纠正之。

彭武一撰《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一书于1989年11月出版问世。彭先生就溪州铜柱铭文论述了六十页之多，对铜柱铭文介绍及其意义而言是较为全面的，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将前人之舛误均撰入他的书中，所以此书舛误同前人相比之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书舛误主要体现于四方面：一是铜柱铭文、二是注释、三是史实、四是学术观点。笔者对此书舛误作了一个初步统计：铜柱铭文之舛误具有六十余处，注释、语译之误具有五十余处，史实和学术观点之误更为突出，可算舛误之首。

为何错误越来越多，事出有因：即从宋代至今，经初步统计，论及铜柱铭文者具有三十余种书籍，其撰写时间越古者，所载铜柱铭文越少；其时间越是往后者，所载铜柱铭文之内容越多，并趋向全面。记载铜柱铭文内容越少者，其舛误亦少，记载铜柱铭文内容越多者，其舛误越多。几乎是成正比关系。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调查研究。

为了正本清源，使读者得到准确答案，笔者便于一九八六年夏天，有意亲赴永顺王村镇果园堡，逐字录得铜柱所刻之铭文，回武汉后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可疑之点。尔后，笔者反复赴王村六次核实、校对之后，将其铜柱原刻、加刻一并载入本书的第一章中，以供读者阅读原文。为了准确起见，本书还将铜柱原址照片和铭文拓片亦一并载入本书之中。

铜柱铭文系古文体裁，又无标点，并非通俗易懂，所以笔者

将古文加以注释，并将古文加上标点，载入本书的第二章中，以利读者能学到一定的古文知识。对于学者来说，亦可作研究之参考。此外，笔者还将五代时的百官制度及有关的历史知识亦撰入本书，使注释具有历史性、知识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使读者能有所受益。

在读者读懂铜柱铭文的基础上，笔者再撰写本书的第三章，即铜柱铭文综合辨正，指出历代典籍，（均系名家之作）对铜柱铭文引用方面和学术观点上之舛误。这仅仅是在宏观上予以纠正。

接着，笔者从第四章起至第十一章止，共计八章，集中颇多笔墨、分析各名家数书在微观上的舛误。具体指出并分析某一本书的具体章节文句之误。并在其舛误之字下记上“·”符号和在舛误文句之后用铜柱铭文来对照。必要时又用笔者“按语”形式来纠正其舛误。使读者读后则可一目了然。

此微观纠正其书舛误，尚有一特点，即按朝代之先后进行编排。一是《薛史》关于铜柱记载考异；二是《欧阳史》关于铜柱记载之舛误；三是《资治通鉴》关于铜柱记载考辨；四是《九国志》关于铜柱记载鉴别；五是《十国春秋》关于铜柱记载考订；六是《十驾斋养新录》关于铜柱记载鉴别；七是清《永顺县志》关于铜柱记载辨析；八是《湘西土司辑略》关于铜柱记载辨明等等。在此，笔者仅以以上八种书为例，但尽量结合其他数书给予分析指出舛误。其他数书均不单独列出。

从五代至今，诸多金石家、民族史学家均对溪州铜柱的迁徙史，铜柱原址及传说，作过颇多的研究与考证。取得了可喜之硕果。但也显现正误杂揉之处。如：铜柱之原址、州城的历史与地望、铜柱传说与迁徙，均系良莠并存，笔者于第十二章中予以纠正。